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 政治文化嬗变

孙兰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 政治文化嬗变

孙兰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嬗变 / 孙兰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04-8876-7

I. ①全… II. ①孙…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
IV. ①D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9402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6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21 世纪是政治文化冲突世纪	(1)
二 西方政治文化问题研究	(7)
三 中国政治文化问题研究	(17)
四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研究视角转换	(22)
第一章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	(32)
一 基本概念界定	(32)
二 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	(39)
三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趋势	(49)
第二章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演变	(58)
一 全球化、网络化	(58)
二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特征	(74)
三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变化	(102)
第三章 民主观念——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政治 文化核心	(114)
一 民主观念何以为核心	(115)
二 民主观念的现实基础	(134)
三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民主观念	(142)
四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公共治理	(155)
第四章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社会化	(175)

一	当代政治社会化结构要素理论	(175)
二	新自由主义政治文化	(185)
三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社会化	(197)
第五章 全球化网络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建设		(223)
一	全球化网络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挑战	(224)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文化	(232)
三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中国政治文化创新	(253)
四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中国政治文化建设	(266)
主要参考文献		(290)
后记		(303)

导 论

当前，在全球化网络化浪潮冲击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甚至对立冲突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与过去任何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同，新的文化冲突体现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差异，比意识形态对立有着更深刻、更重要、更丰富的内涵。

一 问题的提出：21 世纪是政治文化冲突世纪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反映着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作依托。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进程的推进，人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面对全球化、网络化，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它，“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①。世界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乌·贝克和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 页。

各国和民族面临着新的政治体制创新和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焦虑和政治文化危机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文化包括政治理念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因此，研究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就成为一项紧迫和有意义的的事情。

全球化网络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政治价值观念的质疑和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网络化的推进对传统的关于国家的价值观念提出了质疑，使“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冲击，促使起源于18世纪末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一主体的国际体系向多元主体的网络化的全球权力转变，以至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论断。

毋庸讳言，全球化网络化是对地域国家的超越。全球市场、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全球机制、互联网已成为一种客观的强制力量，正在迅速改变着民族国家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状况，使国家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变得越来越紧密，使得主权这一民族国家特有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的排他性权力受到严重侵蚀和削弱，民族国家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全面领导和组织社会政治生活。在全球化、网络化浪潮中日益发展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它们依据国际制度和国际法，拥有某种合法性的超国家权力，它们已经或试图侵入国家管理的传统领域，对国家种种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至政治体制进行广泛的国际干预，从而构成对国家主体性的侵犯。在这种“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中，全球化网络化正在消除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一致性。随着这种一致性的日益消失，国家安全的自主性同样遭到削弱，各种强力干预以至军事干预日趋频繁，国家的安全自主性日渐弱化。其结果是“民族国家逐

渐失去权力”，并将最终“毁灭主权国家，联通世界版图”^①。

其次，全球化网络化对民族认同的冲击。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以血缘共同性为基础的“部落民族”、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民族”和以组成近代意义的国家为共同基础的“政治民族”的三个历史时期。而民族主义则是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民族个体对本民族特征的认同以及在对本民族的生存、独立、主权、发展等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因此，民族主义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它体现为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的一种政治原则：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

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的拓展对居住在固定的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并效忠于国内政府的传统公民观和种族观提出了挑战。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移民人数的增加，传统的那种绝对的种族认同基本上不复存在。即使是居住在国内的普通公民，传统的政治认同也在经受极大的考验。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实现，使得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日益淡化与土地相联系的边界和身份，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淡化原来的国家认同，而滋生出了全球意识，出现了所谓的“新认同政治”，少数先锋派如国际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已经以“全球公民”自居了。

再次，各民族政治文明之间的冲突、同一民族的文明内部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各种因子如政治、宗教、伦理之间的冲突。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以及沟通手段的国际化为世界各国的文化传播、交流、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全球化、网络化过程持续得越长久、涉及的方面越广、力度越大，文化间的交流也就越密切，影

^① 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8页。

响也就越广泛、深入。这种文化传播和融合既是指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亦是指个别文化与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为体现的全球取向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但在后者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和冲突，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网络化作为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其主要规律性与在前全球化时期业已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惯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对立。全球化、网络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自我防卫机制的发挥，使民族文化丧失自我保护的机会陡然增多，极易沦为被动的弱势一方。在各种政治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对抗和对话日益成为当下一道亮丽炫目的风景中，人们不仅要对各民族的政治文明和传统之间作出“何种合理性”的选择，而且还需要在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价值冲突之间作出“谁之正义”的评判。因此，我们正面临一个激烈的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的时代。

随着冷战的结束，壁垒分明的单一政治信仰已不复存在，植根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冲突渐趋平和。一度掩盖在两大意识形态下的文化意识与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间的各种交流、渗溶和冲突便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全方位、多层面地萌发和体现出来，其中宗教和宗教的作用力也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体现出来。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冲击下，全球体系中冲突的性质、结构、空间和意义已经在许多层次上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观点认为，冲突自然来源于民族国家之间国际价值的诸种不相容性：冲突的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价值的不相容性主要集中在安全（国家利益）领域；具体的冲突行为集中表现在战争或物质暴力上；价值分配的不相容性特别是由军事力量征用的；价值分配的模式被认为是在大国之间取得平衡；冲突的根源是人类的逐利本性或无政府状态所致。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与国家集

团之间的价值不相容是很容易的。换言之，价值分配的过程是由民族国家支配的，它们特别关注安全价值或权力价值。

但是，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首先，各种冲突是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国家间的冲突，或超越领土边界的地域内部冲突，这些原来受地域限制的冲突，如今扩大到了世界范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冲突的影响。

其二，经济全球化促使各行为体之间价值选择和冲突的多元化。除了安全价值外，价值冲突的形式还广泛存在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信息资源、自然资源、政治文化、消费方式等等方面。由于全球性问题所导致的各种冲突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使得各种行为体之间不得不通过发展多样的联系来获得各种价值和利益。这样由于各种冲突和选择交互缠结、彼此勾连，各种跨国家、跨地区的冲突又使得多种价值之间相互重叠的互不相容性程度不断加深。结果，武力作为确保安全价值的主要手段，变得再无用武之地。^①

其三，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大众传媒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的舆论乃至人们的思想。他们以实现政治民主、捍卫人权、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具有普适性的尺度，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衡量，其实质是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提供合法性。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认真地考察了全球化概念的生成过程，分析了从作为军事领域用语的“全球”，到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再到国际政治学中布热津斯基的“全球化社会”，最后再到管理学上德鲁克（Peter Drucker）从消费文化意义上使用的“全球购买中心”之后指出，70年代美国

① 参阅〔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刘小林、张胜军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251页。

媒体上的全球化话语已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全球化模式鼓吹文化的同质化或普遍主义，否认特殊性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实际上是在宣扬“一个文化中心决定论”，亦即美国文化中心决定论。对于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全球化剥夺的绝不仅仅是他们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正在削弱他们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非西方文化主权的侵蚀与同化，激起了非西方国家捍卫自己文化主权的力量。因此，抗拒西方文化霸权将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政治冲突的长期内容。

据此，我们再来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的核心观点：“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物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① 尽管亨廷顿是明确地站在西方利益的立场上阐述当今世界政治问题，但是亨廷顿关于世界冲突模式的规范性描述把“文化差异”作为影响甚至支配经济、政治和军事冲突的根本要素，这从一个不同或相反的方向重复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意识——即当代世界和未来的冲突将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尤其是政治文化冲突。世界政治将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多元文明互动、交锋的政治文化景观。正是在这种文化政治化的图景中，发展中国家正在改变传统的殖民主义奴役下的历史客体形象，而成为推动和改造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

由此也说明，全球化网络化并不能遮盖人类文化绚丽多姿的

① [美]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总第19期。

色彩，却以新的霸权的形式试图逐渐抹杀这种多样性的政治经济意义。“政治文化差异”、“政治文化冲突”同“文明共通性”已经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势力平衡而成为国际合作与联盟的基础，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 西方政治文化问题研究

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关注是从美国政治学界开始的。1956年，阿尔蒙德在《政治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系统》一文，由此首开研究政治文化的先河。因而，“政治文化”是源自西方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政治文化的研究尽管只有几十年，但其间随着时代的变迁，却已经历过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到80年代的复兴，以至当代的繁荣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也是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从幼芽破土到新绿绽放的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改进其研究方法的过程。

1. 早期政治文化研究

尽管在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中，早已有人尝试通过分析文化因素来解释政治现象。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提到，1848年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列伯曾指出：“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或治理中寻找的自由，然而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实可谓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里根本寻求不到自由。高卢观点的必然后果，乃是法国人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作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的问题，完全决定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然而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种干预永远只能是集权政制或贵族政制，而当下的集权政制，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

的贵族政制。”^①这一思路上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从中世纪直至近现代，也多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政治问题。但是，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基本上是把政治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民族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文化精神和国家政体的关系等等。对于处在宏观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与个体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之间的中间地带——政治文化的研究却始终无人问津。20世纪3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学派的兴起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隐藏在政治权力结构背后深层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希望通过从微观的、具有说服力的实证性要素来加深对宏观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政治文化作为人的一种政治生活样态，其民族文化基质同政治运行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它是如何影响宏观政治运行机制的？在政治体制的变化中，文化因素起着什么作用？显然，这样的研究可以解释许多从前难以理解的社会政治现象和个体政治行为。

2. 中期政治文化研究

20世纪40年代起，行为主义学派的兴起推动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行为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制度是一种既存的东西，本身没有指示政治的真实内容。政治的真实内容应当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和政治主体围绕制度展开的活动行为。因此，它强调对生活生生的事实和现实的政治行为的研究，而不再是抽象地研究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

行为主义学者的探索则意味着在政治哲学中采用文化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过程和体系的学科的诞生。而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关于人类主观维度对社会结构、社会变革起

① [英]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2—62页。

巨大作用的思想，在后来的政治文化研究者那里，成为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以说，作为先驱者的涂尔干和韦伯，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发轫的直接导入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导向，即主观心理态度的研究上，而态度本身的外部表现，有时候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同样的心理态度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这就需要从心理机制和政治环境的互动中找出其规律。传统的政治学家认为，本门学科的研究内容都是实在的政治现象，不可能使用含义太为泛化、特别是像“文化”这一概念来作为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当阿尔蒙德等人着手研究有关政治行为的内在心理维度时，却发现没有一个恰当的概念来描述存在于人们心理深层的“心理导向”。阿尔蒙德针对当时文化研究的热潮，从德国古典哲学得到了某些启迪，便把关于政治心理导向的研究命名为政治文化。不过，为了强调政治文化的特殊本质，阿尔蒙德不同意从社会文化背景的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它，而是从狭义的角度借用“文化”概念。他指出：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的区别在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的特殊分布。”^① 它包括“认知的、感情的和评价的”以及一般文化价值标准，所以它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并有某种“自决性”。阿尔蒙德的论述为政治文化研究有别于一般文化的研究划定了界限。

由于基础理论的不成熟，当政治文化最初兴起的时候，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调查、访谈、统计分析等为主。所针对的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它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如“文化决定论”、“保守倾向

^① [美] 阿尔蒙德、维伯：《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 页。

论”等。面对各种各样的责难，使一度兴盛的政治文化研究在 70 年代初走向衰落。

3.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

有学者把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概括为六个方面^①：即从偏重微观解释的研究到微观与宏观的互动；从主观心理向度的研究到主观与客观的连接；从相对稳定的静态解释到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从关注传统因素的分析到重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文化决定论到政治文化的多因素分析；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地方化特色的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研究者针对 20 世纪后期，公民的价值观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由“精英主导”型转向“挑战精英”型；公民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投票热情的下降，一种基于生活质量问题基础上的新型政党的出现，如绿党等。在方法上开始突破早期微观狭窄的解释范式，开始对汇集一切社会关系的“人”的重视。这一方面可以说明特定政治是怎样在大的客观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存在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政治如何维持和改变大的客观文化环境。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不再只是投射在某种主观的个性上，而是特定客观环境影响下有限的理性选择。

综上所述，目前，尽管人们对当代世界的单极化还是多极化状况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对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维度基本上是持认同态度，即大的跨国公司集团在全世界进行经济竞争的同时，到处兜售其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观念，如市场经济、民主、自由、人权等。在已有的成果中对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较多，而对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政治文化演变研究基

^① 杜玉华：《论西方政治文化复兴后的方法论变革》，《学术论坛》2002 年第 6 期。

本上是一空白。政治文化具有变异性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毕竟不等于或不能替代当代政治文化。目前，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推进，政治文化研究从民族国家理念向当代政治理念转变；从阶级分析方法论向文明冲突论转变；从政治、经济决定论向文化领域转移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网络化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从全球化、网络化在这些理论中的地位角度看，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全球化网络化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另一类是把全球化网络化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重要参照背景，讨论背景与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前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后一类则是广义上的全球化网络化理论。^① 本书显然是属于后一类即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研究。

全球化、网络化是人类社会实践逐渐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而导致现存民族国家体系演变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政治图景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在变化中出现相互依赖和利益共存的趋势，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又在很大程度上力求维持原有状态，国家之间仍然处在无政府主义的争斗之中。

4. 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目前，国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网络化与政治文化的讨论可概括为具有代表性的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世界体系论”。最有影响的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著作。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看做“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并用“中心——半边陲——边陲”

^① 参见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结构框架来定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体系结构的制约，所谓发展的成功，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而是取决于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变化，即是否进入结构的中心。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的落后国家而言，其“落后”的本质主要体现在相对意义上，而改变落后状态的努力则受到体系整体结构即外部环境的严重影响。

二是“终结论”。其代表人物是大前研一的“民族国家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佩克的“经济增长终结论”。这是在西方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大前研一认为，从投资（investment）、工业（industry）、信息技术（information）、个体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等这四个“I”预示着国界的作用正在消失，民族国家正在终结。“简单地说，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有参与单位的作用。”^①

福山的主要论点是：冷战结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这就导致了“历史的终结”。历史是指单一的连贯的进化过程，人只要满足其基本需求，历史就终结了。而现今的自由民主制度已解决了人类两大基本需求，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二是自由民主给予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满足了人被渴望被承认的精神需求。因此，人类在重要的原则和制度上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了。

佩克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的物质进步已接近极限，人类的本质进步才刚刚浮现出来。例如，发展基因工程研

① 参见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脚注。